



安北与单于都护府



唐代北部边疆 民族问题研究

王世丽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安北与单于都护府

唐代北部边疆
民族问题研究

王冠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080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安北与单于都护府

唐代北部边疆 民族问题研究

王世丽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王世丽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22-04769-7

I. 安... II. 王... III. ①安北都护府—研究②单于都护府—研究③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928.6②K280.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768 号

责任编辑：张 波

装帧设计：张力山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 名	安北与单于都护府
作 者	——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王世丽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邮 编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769-7
定 价	16.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关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作者简介

王世丽，蒙古族，1965年出生于内蒙古奈曼旗。1983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1987年本科毕业后在本校历史系做蒙古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贾敬颜教授，1990年毕业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在云南民族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99年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做博士研究生，师从赫超民教授，2002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民族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现任云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内容提要

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唐朝平定东突厥汗国之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以归降的突厥诸部设立了定襄、云中、顺、祐、长、化、北安、北抚、北开、北宁等羁縻府州，地处漠南，受夏州都督兼任的宁朔大使节制，拉开了唐朝在大漠南北地区普遍设立羁縻府州的序幕。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唐平漠北的薛延陀汗国，于次年在漠北地区设立六府七州，并在漠南的故单于台设立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地区事务，这是继安西都护府之后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第二个都护府。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唐与回纥部联军击破东突厥余部车鼻汗部，在大漠南北的东突厥故地普遍建立起羁縻府州，并先后设立燕然、瀚海、单于三个都护府来管理这个代有强者的民族地区。此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唐朝于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调整了三个都护府的格局，将燕然都护府迁到漠北回纥本部，更名瀚海都护府；将瀚海都护府迁到漠南，改称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安北、单于两大都护府是唐朝设在北部边疆的两个最高级别的军政机关，管理以突厥、铁勒诸部设立的各羁縻府州。两大都护府进则开疆拓土，退则镇戍卫边，它们的置废兴衰与唐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危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北方各族的社会

发展与变迁。唐朝以羁縻府州的形式管理居住在北部边疆的各族人民，对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在详细考证安北、单于两大都护府治下各羁縻府州的建立和废弃的基础上，分析了安北、单于两大都护府在唐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置特点、机构设置、管理职能、任官制度及其在调适唐代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方面的历史作用。

ABSTRACT

Anbei Duhufu and Chanyu Duhufu were the highes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s the Tang Dynasty had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ern Border. The function of these two Duhufus was to control all the Jimifus and Jimizhous (indirectly ruled regions) set among the Turki and Tiele tribes. These two Duhufus conquered more lands when they were strong or protected the borders when they were not strong enough to be expansive. Their existenc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Northern Border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reflec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China. The Tang Dynasty's rule over all the ethnic groups by the way of Jimifus and Jimizhou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s, economies and cultures of peoples living both in the central China and its borders.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 detailed scrutiny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andonment of all the Jimifus and Jimizhous under Anbei Duhufu and Chanyu Duhufu, analyses the characters of the Jimi system practiced by the Tang Dynasty in its different periods of sovereignty and proceeds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s of Jimi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Border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Jimi system carried out in the Tang Dynasty is a flexible political system proper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 The results of the Jimi system were

marred not by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from the Tang Dynasty but by the elite of the ethnic groups who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the Tang Dynasty faced, fanning and coercing Turki tribes to demand their secession and set up the later Eastern Turkistan. Following a line of the establishment, abolition and movement of Anbei Duhufu and Chanyu Duhufu,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approach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and the people in central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fore, based on researches done by the predecessors, the present work improve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Border and ethnic groups living there in the Tang Dynasty.



序

林超民

唐朝经过多年的经营，到唐太宗时，建立了超越秦汉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正如唐太宗所说：“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

唐朝在广阔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依据部落的大小，列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其大者置都督府，小者为县，在岭南地区更小者为洞。在西部地区，还设置了昆陵、濠池两个羁縻都护府，统领西突厥十姓之地。全国总计 856 个羁縻府州，按地区分别由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管辖。

唐代的六大都护府及边州都督府所统领的 856 个羁縻府州占唐王朝整个版图的三分之二以上。在羁縻府州的广阔地区居住着突厥、回纥、奚、党项、契丹、室韦、纛、蛮等数十种族类，他们与华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繁荣富强的唐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

较早注意并研究唐代羁縻府州的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他的《唐代羁縻州述论》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作了全面的论述，他揭示了唐代羁縻府州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论述了唐代羁縻府州的本质与作用，为我们深入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谭其骧教授的指导下，刘统先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这篇博士论文，对唐代六大都护府属下的诸都督府、羁縻州的设置年代、统隶关系、地理方位、兴废沿革作了全面的考订，是研究唐代羁縻府州的创造性成果。

在羁縻府州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唐代统领诸羁縻府州的都护府。可是，除了个别学者作过概括性的叙述外，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王世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唐代诸都护府中相当重要的安北、单于都护府作了深入细致的考究，写出《安北单于都护府与唐代北部边疆研究》的论文。这是相当出色的实证个案研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唐代都护府制度及其所隶属的羁縻府州，进而总结有唐一代处理北部民族关系的得失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丰富并深化了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的研究，是近年来唐代民族关系史、中国北部边疆史、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难得的创造性硕果。

《安北单于都护府与唐代北部边疆研究》论证了安北、单于都护府的设置缘由与沿革、特点与本质、机构与职能、任官与选将、兴盛与撤废、功能与作用等，发前人所未发，更指正前人的失误与讹舛，将唐代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历史地理、边疆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世丽之所以能取得为学术界公认的成就，与她踏实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分不开。王世丽的研究从认真阅读历史文献、广泛搜求原始资料、细心考辨各种论说开始，经历几多寒暑，数易其稿，殚精竭虑才完成这篇堪称开拓创新的论文。充分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证，才开始研究写作。这原本是治学必须严格遵循的正确之道和从事学术理当光大发扬的优良传统。不幸的是，近年来学风衰



败，将治学的正道讥为保守、将研究的规矩嘲为迂腐。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读书求学的人相对减少。不少所谓学者拾人牙慧，翻炒冷饭，检录前人论著中常用的史料，抄袭他人在作品里发明的观点，剪裁拼贴，即成大作。而像王世丽博士这样，苦读于寒窗之下，求索于静室之中，奋发于冷寂之地，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孜孜于飞黄腾达，一心一意为探究历史的真相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学人实在少见鲜有。一部被学术界同仁同声称誉的著作，其背后一定有高尚的人品、敬业的精神、辛勤的劳作。

学术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在古代被称为“立言”。“立言”与“立德”、“立功”一起被视为“虽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要做到“立言”就必须立大志、下苦功、做实事、扎硬寨、打恶战，奋不顾身，拼死向前。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做学问“须是勇猛奋厉，直前不顾去做”，“如战阵厮杀，擂着鼓，只是向前，有死无二，莫更回头始得”。我们既然选择了学术的道路，我们也就选择了勇猛奋厉、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生存方式。从王世丽攻读博士学位的苦读岁月，从她厚重扎实的博士论文，我们看到她对待学术事业“勇猛奋厉”的精神，令我们由衷欢欣与肃然敬佩。

做学问，要有独立追求的人格，独立思考的品性，独立前进的胆识。具有这样的品格，我们才可能独辟蹊径，独创新说。读者在她的著作中会看到，她不羁陈说，多有创获，新意迭现。现在，“独立创新”是一个闪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宣传，是把已有的知识和理念传达给大众；学术，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提出前人未及发现的新知和创见。独立创新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可以授予学士学位；“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由此看来，国家是把博士作为创造性人才来培养。换言之，“独立创新”是衡量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不二尺度。王世丽以她多有创新的《安北单于都护府与唐代北部边疆研究》获得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认真、严格、客观、公正的答辩，当之无愧地获得博士学位，并由此进入了国家独立创新者的行列。我们也可从她的论文中发现，王世丽不仅具有刻苦、勤奋、坚毅、踏实的品格，而且具有学者的睿智与灵气。

撰写历史著作，实事求是地记录、叙述历史事实，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考史、论史的创新研究日渐发展起来。史家注意到历史想象中的“问题”以后，寻求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史学的诠释、思辨、论说功能日渐重要。这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到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后，议论成了史学的主流，不少议论更脱离历史事实，为着现实的某种意图，任意剪裁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直到上世纪的 80 年代空泛议论的风气才有所改变，实事求是之风有所恢复。随着发表论著的压力日渐加大，发表论文成为研究生混文凭、教师晋职称的简单量化指标后，急功近利，编造论著，只求发表，不讲功效，使得学术研究成为编造论文的简单工序。论著如过江之鲫，而跳龙门的鲤鱼却难得一见。王世丽的博士论文早就通过答辩，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肯定。这是一篇叙述历史与考释历史并重的好作品。但是，王世丽并未急于求成，匆忙付梓问世，而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推敲、细心打磨，使之不断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部《安北与单于都护

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其从容不迫的心态、宁静致远的胸襟、精益求精的追求，感人至深、予人启迪。

北部边疆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北部边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巨大的影响。秦汉时匈奴在这里叱咤风云，隋唐时突厥、回纥在这里上演惊天动地的活剧。蒙古从这里出发，金戈铁马，东征西战，席卷天下，让世界至今还在体悟他们回荡在历史苍穹的震古烁今的悲壮乐章。王世丽的著作总结了唐王朝在处理北部边疆问题上的成败得失，虽然还有探讨商量的余地，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唐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的安北、单于都护府不仅对唐王朝一统天下起过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对后世北部边疆的发展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面临边疆危机，满蒙问题一直成为边疆研究的热点。现在，王世丽在21世纪之初向祖国献上的这部研究唐代边疆史地与民族关系的力作，不仅弥补了北部边疆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未来边疆的建设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世丽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具有蒙古人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的气质。她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时，多得名师指点。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贾敬颜教授是著名的中国民族史大家。有幸在名师指点下学习，是人生难得的机缘，也是做学问的福分。正是在贾敬颜教授等名师熏陶、培育下，王世丽的率直、求真、务实的蒙古人精神得以光大，奠定了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

当这部著作问世时，王世丽一定会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2006年3月11日于补拙斋



前 言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时期，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其最盛时，东北到达黑龙江流域以北，北部越过贝加尔湖，西北含有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南部到达林邑（今越南中部），东至大海。与唐朝保持政治隶属关系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国家多达三百余个。唐朝以羁縻府州制管理各归附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册拜各少数民族的首长任都督、刺史，利用他们来实现对各民族地区的管理。林超民博士总结了羁縻府州的四个特点：

1.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
2. 以蕃酋长为都督、刺史，递相统率，皆得世袭。
3. 居民不向国家直接缴纳赋税，户口不呈送户部。由本部酋长首领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方物特产。
4. 可以保留本部族的军队，但要服从朝廷的调遣。

同时指出，羁縻府州不是因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而建立的，而是基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内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建立的（参见林超民博士的博士论文《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为有效地管理各地的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有六大都护府：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单于、北庭。其中安北、单于两大都护府设在北部边疆地区。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安西、安北、单于三大都护府的都护位高权重，常以亲王遥领。尤其是安北、单于都护府所管辖的是突厥、



铁勒诸部民众，这些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上，代有强者，每与中夏相抗衡。当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汗国是东亚地区的政治中心，隋末的各北方割据势力纷纷投靠它，唐高祖君臣也不得不臣事突厥，借其声威以铲平诸割据势力。然而由于游牧民族政权所固有的脆弱性和分散性，威振东亚的东突厥汗国在唐朝建国十余年后就被唐朝所征服，大漠南北逐渐变为羁縻之区，安北、单于都护府应运而生。

安北、单于都护府的研究涉及到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地理变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沿革、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及中原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本书试图通过对安北、单于两大都护府的建置、变迁、撤废的考证，研究唐王朝国力的盛衰、边防政策的推移与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本书重点放在唐王朝在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派出机构都护府的研究之上，利用丰富的汉文文献和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碑铭文字作为基本史料，在学术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继续考察唐代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对北方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进而揭示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和中国之所以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规律性。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代史书层出不穷。有关唐代的原始资料很多，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大唐六典》等等。然而由于受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对于具体事物的记载趋于宏观。例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纪传体和编年体著作都不曾记载安北都护府在漠北时期的行政机构和历任都护的情况，好在各类类书、杂史、文集中保留了大量的典诰、诏敕、名臣奏议，加之考古工作的进展，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北部边疆



的民族历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同时突厥、铁勒、回纥等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随着鄂尔浑河畔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释读，与中国北部边疆关系密切的突厥学日益成为国际性的课题。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俄国的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拉德洛夫（В. В. Радлов《蒙古的古突厥碑铭》），丹麦的汤姆森（V. Thomsen《鄂尔浑碑铭考释》），中国的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等都是早期研究突厥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是我们利用古代突厥文碑铭内容的基础。随着文字释读工作的进展，更多的中外学者致力于碑铭所揭示的文化内涵研究，尤其是对突厥汗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日本的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山田信夫（《突厥传笺注》）、白鸟库吉（《可汗及可敦名号考》）以及羽田亨、小野川秀美等学者都在中国北部边疆历史地理、民族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是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一文，娴熟地利用汉文、突厥文史料剖析了以突厥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特点和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唐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骤兴骤灭的特点有很大帮助。

俄国—苏联时期的吉谢列夫在鄂尔浑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著有《南西伯利亚古代史》（С. В. Киселев,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М., 1951），从考古学上揭示了南西伯利亚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古代突厥所建立的国家在概念上与现代国家完全不同的著名论断，与日本学者护雅夫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对“突厥”一词的理解与伯希和不同，认为“Türk”一词在5~6世纪时“还没有用来特指族称，这表明此一名称及其所反映的关系是相当古老的。